



廖可斌
著

压抑与躁动

——
明代文学论集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廖可斌
著

压抑与躁动

——
明代文学论集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hinese Copyright © 202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压抑与躁动：明代文学论集 / 廖可斌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8

。（北大中文系名家名作自选集）

ISBN 978-7-108-05824-9

I . ①压… II . ①廖… III .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明代—文集 IV . ①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4067 号

责任编辑 朱利国

封面设计 大 铭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网 址 www.sdxjpc.com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年8月北京第1版

202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8

字 数 380千字

定 价 98.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自序

中国古代每个主要王朝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因此都值得深入研究。明朝立国近三百年，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意义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从外部来观察，即把明朝放在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中，放在与西欧等地区的比较中来观察，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图景更清晰，也更令人震撼：在明朝建国之初的十四世纪中叶，中国总体上在全世界还居于前列，与较为发达的西欧相比也并不逊色，某些方面甚或过之；而到明朝灭亡时的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在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制度创新、思想解放等方面已经全面落后了。美国学者彭慕兰（K. Pomeranz）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与欧洲及世界发展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从此中国一直落后于西方，以致再过两百年后，当中西方开始大规模碰撞时，中国被西方打败，并从此长期饱受欺凌。“大分流”是中国与世界发展中的大事件，它就发生在明朝，这就使直到今天仍在为追赶西方而进行着艰难努力的华夏子孙们，在回望中国历史时，不免对明朝怀有特别复杂的感情，同时也予以特别的关注。

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本身来看，明朝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尽管明朝没有像同一时期的西欧那样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是相对停滞，但三百年里社会不可能凝固不动。明朝社会内部的变化主要包含了两种力量的增强及其相互之间的冲击。一种力量是，在经历了元朝野蛮与开放并存的社会发展过程之后，出于自身的农民意识，同时受强大的中原文化传统的制约，朱元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伦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

了以小农经济和君主专制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开创了所谓的“洪武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体制机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固化了社会形态，限制了它的发展和蜕变。另一种力量是，明中叶以后，由于“洪武模式”的控制力有所减弱，由于社会恢复性增长以后带来的人口压力，由于生产技术的某些进步，更由于人们追求比较富足生活的本能驱使，环太湖地区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较快发展，市镇繁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发生较大变化，追求富有、享乐和一定自由的思想意识形态也逐步形成并弥漫开来。虽然这种现象还仅仅发生于庞大帝国的一个小小角落，虽然这种新的经济和思想意识力量本身的真实性质和潜在发展趋势还有待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P. C. Huang）就认为它仅仅属于一种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因此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不同于通向现代社会的“现代经济增长”等等，但它们与传统的小农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它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冲击也还是比较强烈的。顺便指出，明代中晚期，海外贸易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欧洲传教士络绎来华，传播基督教思想和西方科技，在少数士民之间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庞大而古老的帝国来说还极为微弱。现代有些学者，如《白银资本》的作者弗兰克及受其启发的海内外许多研究者，出于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历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动机，特别强调这一因素对明代特别是晚明社会发展的作用，似略有过头之嫌。明代社会的演进，主要还是体现为上述两种内生力量的发展。这两种力量之间自然产生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可以概括为“压抑与躁动”，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明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就这一点而论，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与西欧社会的发展，确实出现了某种奇妙的“同步共振”现象。只不过中国社会体内躁动的这个胎儿，不管它的性别面相如何，最后是胎死腹中了。

如果做更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它们之间矛盾冲突的情形，就不止一方压制、另一方冲击这么简单。压制的一方，为应对后者的出现和发展，除

一般正常的压制外，还会演化出种种新的形态，如极度严苛不近情理的禁铜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虚伪，和有时妥协调适以及由此造成的某种不自觉的蜕变等。冲击的一方，因为前者的存在，除一般正常的冲击外，也会演化出种种形态，如极度激烈夸张的怪诞言行，以及力求与前者之间达成调适的自我约束或自欺欺人，等等。总之，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都可以这种“压抑与躁动”的主流及其分化延伸出来的种种支流作为基本讨论框架。

历史研究不能过于实用主义，不能过分强调为现实服务，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毕竟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动力来源。一百多年来海内外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大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对“大分流”现象的关注有关。“大分流”问题可以说是隐藏在众声喧哗的明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主旋律。明代历史文化研究的巨大魅力和重大意义也在于此。我之所以不知不觉撞进明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是受此驱使。与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角度切入的相关研究相比，文学研究往往因为不够实证而缺乏强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但文学研究自有其优势和价值，因为文学能最敏锐、全面、生动地展现社会生活状态及其变化，并直接指向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心灵世界。因此，明代文学研究理应成为观察、解释包括“大分流”现象在内的明代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侧面。

然而，确定远大的研究宗旨是一回事，从事具体的研究又是另外一回事。一旦进入实际研究过程，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处理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包括文学本身的种种问题，战线越拉越长，分工越来越细，以致最后几乎看不到某种具体的研究与原定的根本宗旨之间有何直接关系。但离开了种种微观的甚至有些琐碎的研究，那个巨大的历史之谜也不可能解开。而且，怀抱着一个遥远的梦想进行的研究，总比那些不知道为什么研究而做的所谓研究要好。本书收录的二十一篇文章，显然也只能归入这种微观的甚至有些琐碎的研究之列，但我自始至终怀有叩问“大分流”历史之谜的梦想，力图从文学角度探寻明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因

此以“压抑与躁动”作为书名。抚卷自叹，自知卑之无甚高论，在为自己的精力有限、智力尤其贫乏深感惭愧的同时，对那些能为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做出深刻分析和解释，甚至只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现象做出透彻说明，能给人们带来某种启迪，从而能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一定积极作用的智者，都充满由衷的敬意。

本书出版，得到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常绍民编审的热情关心，谨致谢忱。

廖可斌

2016年4月10日于燕园

目 录

自 序 1

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 1

论宋濂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及其他 29

论台阁体 45

论景泰至弘治中期的文学思潮 85

论茶陵派 105

李何之争：学古主张的二律背反 119

关于李梦阳“晚年自悔”问题 133

严嵩与嘉靖中后期文坛 149

唐宋派与阳明心学 157

晚明浪漫文学思潮美学理想的三个层次 185

万历为文学盛世说 203

汤显祖的文学史观与文体选择 223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主人公金碧峰本事考 255

《征播奏捷传》的成书方式和思想倾向 277

《水浒》、明代的“《水浒》热”、金圣叹的《水浒》评点 301

爱佳人则爱 爱先王则又爱 325

谈明人对《琵琶记》的评改 337

晚明戏曲的“戏剧化”倾向 351

关于文学思潮史的写法 375

关于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的关系 401

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

一、元代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与元末文学中心的南移

总观元代文学的发展，大致包括两种倾向。一是正统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受程朱理学影响较深的诗文创作及“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二是非正统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具有一定离经叛道性质的诗文、词曲及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形式的创作。二者之中，后者显然更具有生命力，因此终元之世，这种倾向的文学创作得到了长足发展，主要体现为通俗戏曲小说的繁荣，以及带有一定离经叛道色彩的诗文创作风尚的流行。然而在明代初年，情况却发生了根本转变。正统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垄断了整个文坛，非正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则受到严厉打击和压制。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这一变化，不仅带来了明前期文坛长达百年的沉寂，也造成了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停滞。因此，无论从考察明代文学思潮演变过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总结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它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

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自然在于君主专制社会制度此时已步入晚期，已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君权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专制的同时，加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但是，规律并不能包括所有的现象，它本身也必须通过一系列偶然事件和具体契机才能实现。因此，规律性的一般论述并不能代替对具体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详细考察。我认为，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显然与当时由于政治、

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几种地域文化及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有关。对后者进行深入研究，必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变迁的历史真相。

所谓元末明初几种地域文化及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又以各种地域文化及地域文人集团在有元一代的分化为前提。这种分化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南北文化及文人集团的分化，二是南方各地域文化及文人集团的分化。中国自古幅员辽阔，不同地域文化的风格特征及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或虽然统一，但中央政权没有充分推行统一文化政策的时期，这种差异就变得更加显著。春秋战国时期和南北朝可以看成是前一种类型的例子，元朝则是后一种情况的代表。元王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它对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总的来说比较疏略。作为推行统一文化政策的重要手段的科举考试也长期废置不行，使不同地域间文化交流失去了一条重要纽带。于是各个地域的文化就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自然发展的状态。与此同时，元朝统治者还在政治上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排挤打击汉族特别是南方的知识分子。北方士子特别是蒙古、色目人，不必读书作文，由刀笔吏出身，便可飞黄腾达。而南方士子不仅因为科举考试的废置失去了登上仕途的机会，而且即使进入仕途，也只能担任一些佐贰卑职，永无致身通显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南方知识分子都选择了隐居不仕的生活道路。那些家境富裕者，不做官照样锦衣玉食。因为不必穷年累月钻研科举考试之道，又没有官场公务和种种格套的束缚，他们反而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与个人兴趣和信仰相关的事业。有的遂专心致志地讲习践履两宋以来得到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有的则从事诗文、散曲和戏剧的创作以自娱。于是有元一代，特别是元代末年，南方理学名家辈出，诗人猬兴。本来随着宋室南渡，文化中心已经南移。经过有元一代的发展，南北文化的差距就拉得更大了。陶安在《送易生序》中描写道：

国朝重惜名爵，而铨选优视中州人。刀笔致身，入拜宰相。出自科第，往往登崇台，参大政。才学隐居，辄征聘授官。下至一技一能，

牵援推荐，取绯紫不难，中州人遂布满中外，荣耀于时。唯南人见厄于铨选，省部枢宥、风纪显要之职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寥焉。山林草泽之士，甘心晦遁，穷理高尚，终老文学。故近年四书五经，论释益粹，纂附益精，其书遍天下。圣贤之道，如日月丽天，江河行地，辉光润泽，无所不至。使朱子理学之绪益盛以昌，其渊源有自来也哉。以是观于今之世，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北士志于文学者，率来求乎南。^{〔1〕}

叶子奇《草木子》中也有类似的记载。^{〔2〕}应该肯定他们的这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明初宋濂、王祿主持编纂的《元史》打破前代史书体例，合“儒林传”“文苑传”为一，立“儒学传”，共收 28 人（附传者不计），其分布情况如下表（行政区划按今制）：

浙江	江西	江苏	福建	安徽	陕西	河北	河南	总计
11	6	3	1	1	2	3	1	28

清邵远平《元史类编》将《儒学传》与《文翰传》分列，其《儒学传》共收 45 人（附传者不计），其分布情况如下表（行政区划按今制）：

浙江	江西	江苏	福建	安徽	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陕西	总计
6	16	1	4	3	6	3	2	1	3	45

其《文翰传》共收 188 人（附传者不计），其分布情况如下表（行政区划按今制）：

〔1〕 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六，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清涵芬楼钞本，第 2969 页。

〔2〕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卷四下，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9、81 页。

浙江	江西	江苏	福建	安徽	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湖北	湖南	广东	四川	陕西	辽宁	内蒙古	维吾尔	不明	总计
69	41	19	8	3	13	2	3	3	3	5	1	6	2	1	1	2	6	188

从以上三表可以看出，当时南北文化的发展确实存在很大差异。实际上这还是综合整个元代的情况而论，若只就元末而言，则文化中心向南倾斜的现象显得更加突出。在南方各地中，文化事业又相对集中于现在的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安徽五地。分别言之，理学方面以浙江、江西最为重要，福建、安徽次之；文学方面以浙江、江苏、江西最为重要，福建次之。这几个理学中心的学术旨趣各有特色，而几个文学中心的宗旨和风格更是大不相同。元末明初地域文化及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即在它们之间展开。

二、元末吴中派

1. 吴中派与张士诚集团

当时的吴中地区，以平江（今苏州）为中心，西及无锡、江阴等地，东至松江，以及现属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地。这一带是全国著名的粮食和桑麻产区，又兼有渔盐之利，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城镇繁荣，商业发达。元代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军蜂起。至正十三年（1353）五月，盐贩张士诚起兵，十六年（1356）二月破平江，二十三年（1363）九月自立为吴王，二十七年（1367）九月为朱元璋集团所灭。在这十余年间，元朝的军队与农民起义军之间，元军的各个派系之间，农民起义军的各个派系之间，正在中原、关陕、楚中和江西等地鏖战。张士诚则与元朝保持着时叛时降、若即若离的关系，又没有远大志向，不想出兵与群雄争锋，只图保境自守，故吴中一直比较安定，外地避兵者多流寓于此。张士诚为人宽和，轻财好

施。起事不久，即筑景贤楼，开弘文馆，招礼儒士，信用文史。其弟士德封楚国公，官平章，总揽军政，尤能礼贤下士。其他重臣如左丞潘元绍、参政饶介等，周围也集中着大批文人。瞿佑《归田诗话》卷下载：

张氏据有浙西富饶地，而好养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争趋附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有为北乐府讥之云：罗辩儿紧扎梢，头戴方檐帽，穿领阔袖衫，坐个四人轿，又是张吴王米虫儿来到了。^{〔1〕}

文征明《题七姬权厝志后》曰：

伪周据吴日，开宾贤馆，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萃于吴。其陪臣潘元绍，以国戚元勋，位重宰相，虽酗酒嗜杀，而特能礼下文士。^{〔2〕}

《列朝诗集小传》记释道衍（姚广孝）语云：

（饶）介之为，人，倜傥豪放。一时俊流，如陈庶子、姜羽仪、宋仲温、高季迪、陈惟寅、惟允、杨孟载辈皆与交，衍亦与焉。书似怀素，诗似李白，气焰光芒，烨烨逼人。^{〔3〕}

在张士诚及其陪臣们的招揽下，许多文士都入藩府任职。如杨基曾任记室，徐贲、张羽都被辟为属，陈基任学士院学士，张宪任枢密院都事，陈汝言任参谋，张经任松江府判官，钱用壬任参政，苏大年为参谋，陈秀

〔1〕 瞿佑《归田诗话》“袁姑苏”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页。

〔2〕 文征明《甫田集》卷二十一，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0页。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饶右丞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民任翰林学士，姜渐任行省都事等。高启、余尧臣、宋克等可能也曾受职^[1]。杨维桢、王逢等虽未受职，但都是张氏集团的座上客，曾为其出谋划策。总之，当时居留在吴中的著名文人，几乎被张氏集团囊括无遗。

与此同时，吴中的大地主、大盐商们，也都建筑园亭池馆、养女优、玩古董、招延名流、咏诗作文。各方文士荟萃于此，廩饩既厚，遂得以专心讲求艺事，互相观摩品评。不少人既是诗人，又是书法家、画家、古董鉴赏家。《明诗纪事》载：

元季吴中好客者，称昆山顾仲瑛、无锡倪元镇、吴县徐良夫，鼎峙二百里间，海内贤士大夫闻风景附。一时高人胜流、佚民遗老、迁客寓公、缁衣黄冠，与于斯文者，靡不望三家以为归。^[2]

《明史·文苑传》中说：

顾德辉，字仲瑛，昆山人。家世素封，轻财结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节读书，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筑别业于茜泾西，曰“玉山佳处”，晨夕与客置酒赋诗其中。四方文学士，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张雨、于彦、成琦、元璞辈，咸主其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饩馆声伎，并冠绝一时。而德辉才情妙丽，与诸名士亦略相当。^[3]

[1] 徐贲《北郭集》卷四《丙午中秋与余左司王山人高记室同过张文学宅看月》，商务印书馆1936年《四部丛刊》三编景明成化刻本卷四，第1页。此诗作于平江被围时，则余、高等曾被张士诚授职可知。当时诸人与张氏关系若即若离，授职不受亦不辞。张氏败亡后，诸人皆讳言事张之事，故多谓曾拒绝张氏征辟云云。

[2] 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册，第504页。

[3]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传》一“顾德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25页。

据《列朝诗集》统计，顾德辉相与酬唱者，仅其所编《玉山雅集》中可考者就有三十七人。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又载：

华亭杨竹西，住张堰，家有不碍云山楼，与曹云西、顾金粟、倪元镇诸公游。吴绎写其像，元镇为布树石，而诸名士题咏之。余家有杨铁崖书《竹西记》，赵仲穆作图，而马文璧诸公皆有咏，盖风流文雅之侠也。元季士君子不乐仕，而法网宽，田赋三十税一，故野处者得以赏雄，而乐其志如此。^{〔1〕}

在一些有钱有势之人的倡导下，当时吴中还定期举行诗社活动。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2〕}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刻其尤者为式。饶介之仕伪吴，求诸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第一，季迪次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3〕}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六记松江的情况云：

〔1〕 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十九“马琬”条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册，第393页。

〔2〕 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3〕 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卷六，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92页。

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与苏州并称，虽富繁亦不减于苏。胜国时……吕巷有吕璜溪家……即开应奎文会者是也。走金帛聘四方能诗之士，请杨铁崖为主考。试毕，铁崖第甲乙。一时文士毕至，倾动三吴。^{〔1〕}

总之，当时吴中地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相对安定，为文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而张士诚集团及当地大地主、大盐商们的扶助，又对之起了促进作用，于是吴中的文学创作趋于繁荣。当元代末年遍地战火、满目狼烟之时，吴中俨然成为新的“稷下”“邺下”，成为全国文学活动的中心。虽然同时浙东和江西文人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但由于不具备吴中地区那样优越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这些文人基本上都分散野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和创作氛围，其声势远不能与吴中派相比。

2. 吴中派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

在吴中派作家中，成就较突出，影响较大，因而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杨维桢和“吴中四杰”。杨维桢本为山阴人，泰定四年（1327）成进士，署天台尹，改钱塘盐场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调。后因得罪元行省丞相达识帖睦尔，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明史·文苑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云：“吾昆山顾仲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2〕}据陆容《菽园杂记》，杨维桢倡为《西湖竹枝词》，南北名士属和者，虞集以下凡122人，其中吴郡人士26人。^{〔3〕}姚桐寿《乐郊私语》又载：

〔1〕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6页。

〔2〕 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卷六，第291页。

〔3〕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8页。